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4.006

# 西方生态批评中的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

龙其林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 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是西方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1968 年以来, 西方学者围绕生态批评与地方、地球及行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后这三个时期,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西方生态批评中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的凸显, 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界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 西方生态批评; 地球话语; 行星视野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4-0036-06

**引用格式:** 龙其林. 西方生态批评中的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4): 36-41.

## Earth Discourse and Planetary Vision in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LONG Qi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Earth discourse and planetary perspective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Since 1968, Western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various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local place, the Earth and other planets. During the 1960s, 1970s to 1990s, as well as the post 21st century, these studies have shown significant phased characteristics. The prominence of the Earth discourse and planetary vision in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f human ecological issues in academia.

**Keywords:**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the earth discourse; planetary perspective

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出版, 被认为是世界环境保护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这本著作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化学制剂之于生态环境重大影响的警觉和思考, 呼吁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人们在追溯全球生态文化的兴起时无法绕开这部重要作品, 但是西方生态批评中地球话语和行星视野的形成却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 并非是对蕾切尔·卡森思想的简单复制。随着 1968 年人类首次从太空拍摄到地球的实景照片, 西方学者意识

**收稿日期:** 2023-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化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书写研究”(22FZW084); 广州大学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稿”(YM2020009)

**作者简介:** 龙其林(1981—), 男, 湖南祁东人,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副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

到环境问题与地球整体、地球生态与宇宙环境之间的关系密切，一些学者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意义的阐述。所谓地球话语，指的是在生态意识逐渐兴起之后，学术界形成的对于地球生态整体所作的语言表述，而行星视野则是学者跳出人类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站在更为辽阔的宇宙环境将地球视为宇宙中的普通行星，进而形成的关于人类如何保护地球、人类与宇宙、地球与其它行星的关系等方面的思考。无论是地球话语，还是行星视野，都是生态意识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地球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之后形成的思想。它们见证了环境保护主义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过程，对于人们如何更加全面地看待全球化与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Earthrise：地球形象的呈现与全球意识的形成

人类探索地球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但是直到1968年12月24日之前，人类还从未从太空看见过地球的外形。1968年12月24日圣诞夜，人类第一次从太空中拍摄了地球的照片。这张名为Earthrise的照片使人类首次对地球有了一个宏观的、客观的印象，让人类真切地感知到了地球是一个怎样外形的星球，从而帮助人类理解和审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不过，Earthrise并非全地球照片，其只是呈现了整个地球大约一半的形象。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再次绕地球轨道运行并执行观测月亮任务时，太阳正好位于宇航员背后，于是他们拍摄了一幅位置极佳的全地球照片“蓝色大理石”，这也是人类首次拍摄到的地球整体形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自己身处的地球及太空有了更多了解，能够跳出狭小、局部的地方经验而朝着地球以及行星的广度看待生态问题。20世纪60年代，首次通过太空飞船从外太空拍下了地球的直观形象之后，人类的全球化意识越发明显，人们在思想上更加重视不同国家、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并形成有机整体的。换言之，地球形象的出现，加快了人类环境保护的注意力从地方转向全球乃至宇宙的进程。

1963年，理查德·巴克明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将地球视为一艘“宇宙船”

（spaceship earth），认为地球仿佛一台综合设计的机器，操作者需要对地球系统非常了解并精心维护才能长期良好地操作它。1965年，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E.Lovelock）提出了盖亚假说。拉夫洛克认为，地球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有生命的有机体，地球上的生命体与大气、海洋、极地冰盖、岩石等自然环境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联。拉夫洛克提出，地球表面的温度和化学组成是地球这个行星生命总体主动调节的结果，地球的大气化学成分、温度和氧化状态受天文的、生物的或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发生变化。在《盖亚假说：对地球上生命的新认识》一书中，拉夫洛克提出，地球是一种所有生物与矿物组成的共生体，这个共生体有利于所有的生物联合，并通过反馈机制使地球上的生物处于有利于生命活动的状态。在拉夫洛克的观念中，地球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能使这个有机整体中的成员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生态问题与人类自身密切相关，同时也因人类而起，所以深层生态学才会略显极端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建构关于生命的整体意识，强调凸显自然的内在价值。”<sup>[1]</sup>盖亚假说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启迪人们将地球视为一个生命的有机整体，而不执着于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分；提示人类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应从地球整体进行考虑，将生态问题视为整个地球的一个关联现象，并采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的形成原因。盖亚假说昭示人类，地球上的生物都是地球母亲的后代，人类不是地球的主人和统治者，而只是地球母亲的后代之一。在地球母亲的生态系统中，人类与其他生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人类应该学会与其他生物友好相处。

1965年7月9日，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上发言时提出，要将地球看作是是人类共同旅行的小小宇宙飞船，认为它的一切都依赖于地球上容易受到损害的空气和土壤。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越来越成为一个狭小的村落，传播速度的提高事实上使得地球的空间缩小，地球上不同国家、地区可以实现资讯的快速传递，从而最终消除了时间

和空间的明显存在。地球村时代的来临,使得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义务在公共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了“全球公地”(global commons)的比喻。他认为,由于地球上的资源受到人类的无序开采,其必然导致地球资源的枯竭。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全球生态运动逐渐兴起,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新社会运动之一。

## 二、生态时代与人类地球话语的确立

20世纪70年代是生态文化日益深入人心的时期,最为代表性的事件则是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大会。1972年,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Barbara Ward & Rene Dubos)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为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准备了一份非官方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报告提出:“由于空气和气候的全球相互依赖性,各地区自行决定的对策是不解决问题的。即使把各地周密的决定全部加在一起,仍然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何况各地的周密决定本来不过是大胆的乐观假设而已。像这些全球性的问题,显然需要全球的决策和全球关心。这需要协调一致的权力去进行监测和研究工作。这意味着要有新的控制飞机排气的国际条约,并对超音速飞机的发展作出国际的评定。这也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责任体制,同时还需要各国之间的有效行动,切实负起这个责任。”<sup>[2]</sup>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第一次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为造福全体人民和后代而共同努力。宣言倡导尊重地球和生命的多样性,以理解、同情和爱心关怀生命共同体,保障地球的恩惠和美好能够施及当代和未来的一代又一代。宣言强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类中具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在使用地球上不能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

范将来其被耗尽的危险,并且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好处<sup>[3]</sup>。这次会议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生态时代,“地球环境”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会议公报《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自觉地站在了太空视角上看待地球生态问题:“从太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小而脆弱的圆球,显眼的不是人类活动和高楼大厦,而是一幅由云彩、海洋、绿色和土壤组成的图案……从宇宙中,我们可以将地球作为一个有机体加以认识和研究,它的健康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健康。”<sup>[4]</sup>丹尼斯·米都斯等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其强调:基于地球是有限的事实,任何人类活动包括粮食生产、资源消耗、污染产生及净化等越是接近地球支撑的能力限度,就越容易引发深重的生态灾难。

1973年,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提出深层生态学概念,旗帜鲜明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要求全面反思导致生态危机的人类思想根源和文化传统。奈斯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的系列基本原则,其包括地球上非人类生命的繁荣昌盛有其自身价值,这些价值与它们对人类有用与否无关,相反,非人类生命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即使只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人类也无权减少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人类对非人类环境的过度干预导致了严重环境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快速恶化;等等。1974年,氟利昂大量排放可能导致臭氧层破坏的问题首次被提出,这一问题在8年之后被科学家所证实。同年,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一书中,将地球视为一个封闭循环的系统,其如同机器一般进行着庞大而复杂的运动。“环境组装了一个庞大的、极其复杂的活的机器,它在地球表面上形成了一个薄薄的具有生命力的层面,人的每一个活动都依存于这部机器的完整和与其相适应的功能。……这部机器是我们生物学上的资本,是我们全部生产需求的最基本的设备。如果我们毁灭了它,我们的最先进的技术就会变得无用,任何依赖于它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也将崩溃。环境危机就是这日益接近的灾难的信号。”<sup>[5]</sup>同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德奥波妮出版《女性主义或死亡》一书。该书首次提



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将男性对于自然的统治与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进行并置，认为这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倡导将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主义运动加以结合，以便按照新的模式塑造地球。1976年，绿色和平运动提出了《相互依赖宣言》，认为地球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学会像尊重我们自己一样尊重它，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护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在此基础上，它还提出了生态学的三大原则：一切生命形式都是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稳定性取决于其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所有资源均是有限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生态保护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80年代的酸雨问题以及90年代的臭氧层破洞、森林砍伐、气候变化及全球暖化等议题，均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相应地，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于地球生态问题的思考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983年，莉奥妮·考尔德科特、斯蒂芬妮·利兰主编的《重拾地球：妇女为地球生灵大声疾呼》一书出版，该书从全球视野中探讨了女性主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如女性主义与生态学、女性主义与反核运动等。1984年，美国学者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出版了《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生态政治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思想，认为绿色政治适用于整个地球与人类。他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全球性质的。无论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军备分歧、粮食政策、国际金融，或者是研究通讯联络，面对着我们的都是一个有限的、人口居住密集的和全球相互依赖的世界。承认世界共同体的这种动向以及承认这种动向就体现于全球生态系统之中，这是最基本的，因此，对全球绿色政治学的需要是最根本的，换句话说，绿党的观点适用于整个地球和全部人类家庭<sup>[6]</sup>。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其重申了1972年6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强调了人类的家园地球的完整性和人与自然的互相依存性，希望通过在国家、社会重要部门和人民之间建立新水平的合作来推动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形成，为维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完整的国际协定而努力。1996年，第一本生态文学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出版；

1998年，英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Writing the Environment: 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以及ASLE第一次大会论文集《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出版。同样在1998年出版的威尔森（E.O.Wilson）《一致：知识的综合》一书，将生命科学理念融入到生态批评中，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不同事物组成的、相互影响的联合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知识经验，因此在生态批评中需要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

### 三、星球视野：人类生态认知的新发展

21世纪后，地球的生态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学者们对地球生态问题的发生、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审视，力图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提出新的观点和解决措施。

德国学者莫尔特曼在《地球的毁灭与解放》一文中提出：通过精神，我们同自然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联合体是一个由人类和自然组成的系统，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描绘成精神的生态系统。通过精神，作为系统一部分的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地球”（盖亚[Gaia]）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在地球与太阳、空气与水、白天与黑夜、夏季与冬季的不断循环中，并赖以为生；人类是宇宙生存系统的参与者和子系统，是生存于其中的圣灵的参与者与子系统。因此，更重要的在于，把人类对精神的意识扩展到尽可能多的精神的组合中去，按照我们所说的精神的组织原则（自傲与整合、自我保存与自我超越）来扩大个体意识，以便使它延伸到社会的、生态的、宇宙的和神圣的意识中。这样，个体的意识便进入更高级、更复杂、更多层次的精神的组织形式中去，并达到生命更多样和更高级的相互交替中。这样，神圣的、宇宙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精神也会达到对它在人类中的自我的更进一步的和更高级的认识<sup>[7]</sup>。

美国学者丹尼尔·A·科尔曼（Daniel A. Coleman）认为，在工业社会以前，人们通常重视

生命的存在与价值,但是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技术主义逐渐统治了地球,因此只有建立起尊重生命的社会价值观念,人类才有可能阻止地球的毁灭。他指出:“哪里若有现代技术破坏了地球,此技术必定是受功利性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物欲至上价值观所驾驭。假如要让技术去修复地球,这种技术必须重新构建,而且必须按照根本上尊崇自然和人类社群的宽泛价值观来构建。机械世界观已侵蚀弥漫了我们的意识,甚至是我们的自我感受。以此观之,可以显见,面对目前的危机,单一的技术方案将于事无补。”<sup>[8]</sup>日本学者石弘之在《共有地和地球环境》一文中认为,“生态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与从前相比,人们在环境问题认识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人们逐渐对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文明的存在方式以及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等产生怀疑。“环境”不再指单纯的物理、化学、生物上的环境,同时也与价值观、经济体系、政治体系这些概念联系了起来<sup>[9]</sup>。

2002年,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在法国出版了《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一书,提出21世纪是自然的世纪,人类将以“还自然之魅”作为己任,这种时代责任与人类地球意识的形成密切相关。他说:“作为全球社会中的民族、国家、市场,它们的前景正是趋同。地球村落、信息网络、全球市场、人类家庭这些隐喻在视觉上比在思想上更为清晰,而思想从定义上来讲就是抽象的。如果对此深入理解,其实目前的特异性和差异性似乎构成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混沌,在巨型崇拜和进步主义的作用下,将形成一个世界,融入一个惟一的宇宙。”<sup>[10]176-177</sup>“古老的事物——地球上的昆虫,宇宙中的黑洞,并不因为新生事物——地球上的人类,无限空间中的星系——的出现而消失。将这些历史的线索与我们的历史相比,它们很有可能为我们揭示一个多元宇宙(multivers)而不是单一宇宙。”<sup>[10]177</sup>同年,米歇尔·托马斯豪(Mitchell Thomashow)在《将生物圈带回家:学会感知全球环境变化》一书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应思考如何使大规模生态变化与民众的关注结合起来,在对本土环境变化的了解中建立起全球共享的信息网络,从而帮助人们掌握全球生态状况的发展变化。2005年,劳伦斯·

布伊尔出版了《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认为环境批评的兴起从属于人类修改地球空间的历史。伴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地方逐渐由作为抵抗政治的前提转变为一个宏大的概念,甚至星球亦可被视为一个地方,于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地方意识不断兴起。“全球主义观念和失地方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全球主义可能超越地方,甚至消除特定的地方,像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多林·马赛(Doreen Massey)主张的那样,它可以‘通过与其他地方的互动而非与其对立’来建构新的地方‘身份’(Massey, 1994: 121)。比起传统区域主义者想象的封闭社区,这样的身份更像是既有‘多种声音’又有‘多个地方’(Rodman, 1992)。同时,即使不是在文学批评中,至少也是在文学中,像全球性地方意识这种东西正在出现。”<sup>[11]</sup>

2008年,斯科特·斯洛维克在《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一书中对于生态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全球变暖”的简单化表述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使用“气候变化”这一中性词更能表现出地球气候的实际情况,而在这两个词语的背后隐藏的是关于科学精确性与修辞力量之间的较量。“‘(全球变暖)’这个实际上已经深入通俗词汇的词组并不能很好地描述全球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这一实际现象的复杂性。根据科学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全球升温的过程。诚然,气温大体上在不断攀升——但人们也注意到其他的天气模式。冷暖趋势同时并存,有时随着年景的更替气温趋向也发生轮换,而总体是在变暖。”“出于修辞的原因,我认为比起‘全球变暖’来,我们来谈‘气候变化’那些令人担忧的隐含意义是比较合理的——不过话虽如此,我得承认科学及通俗文学仍使用着‘全球变暖’这一用语。”<sup>[12]</sup>

2008年,厄休拉·K·海斯(Ursula K. Heise)在地方感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星球意识的观念。海斯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过去时,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已经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生态环境的恶化打破了人们对于地球生态胜景的幻想,地球上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等问题影响到地球上的每个人。海斯认为,地方感虽然有存在的可行性,

但是生态批评更需要地球感、全球感。换言之，人们应该自觉地站在地球生态的立场上，发扬生态世界主义精神，将个体和群体看作人类及非人类组成的自然全球范围内想象共同体中的一部分<sup>[13]</sup>。在《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环境想象中的全球》一书中，海斯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生态环境保护应该跳出狭隘的地方经验，而代之以更为整体的星球意识。他指出，本土知识的去地域化未必对环保主义研究不利，相反，它开拓了树立生态意识的新路径。在全球联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对生态意识和环境伦理至关重要的并非地方意识，而是星球意识——一种关于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生态网络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实，那么它也指出了这些活动是如何融入更大的网络系统的<sup>[14]74</sup>。同时，他认为，如果掌握地方知识的价值在于，它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了解全球关联性的重要途径，那么，那些同样有助于提高这方面认识的非地方性知识和问题也应当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环保主义思想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将其文化想象的核心从地方意识转移到更少地域性、更多系统性的全球意识上来<sup>[14]75</sup>。此外，露丝玛丽·萝特(Rosemary Ruether)的《整合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和世界宗教》、阿尔·萨勒(Ariel Salleh)的《生态自足和全球正义》等论著，也主张将地方概念扩大到全球(地球)范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文化逐渐兴起，推动了全球生态运动的发展，学术界对于生态批评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如果说在生态文学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生态批评更多强调具体地方、空间中的自然生态平衡，将地方神秘化、浪漫化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生态批评的全球意识有了缓慢的发展，生态批评渐渐地具有了世界主义观念，并形成了从全球范围考虑生态问题复杂性的生态批评地球话语。当下，生态问题超越国家、民族、地域，构成了全球性的深层次问题，生态批评也以更为宏阔的地球话

语方式探讨全球环境危机，倡导学者们站在更为宏伟的视角上反观地球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从而使生态批评具有了行星视野。

#### 参考文献：

- [1] 王华伟.身体的诗意与诗意的身体：兼论身体诗学的生态面向[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3): 119.
- [2] 芭芭拉·沃德, 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M].《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 译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230.
- [3] 人类环境宣言[M]//万以诚, 万妍.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4.
- [4]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R].王之佳, 柯金良,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2.
- [5]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M].侯文蕙,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2.
- [6] 弗·卡普拉, 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267.
- [7]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M].隗仁莲, 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 26-27.
- [8]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6.
- [9] 石弘之.共有地和地球环境[M]//佐佐木毅, 金泰昌.地球环境与公共性.李欣荣,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6.
- [10]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11]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刘蓓,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01-102.
- [12] 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M].韦清琦,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27.
- [13] HEISE U K.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1.
- [14] 厄休拉·K·海斯.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环境想象中的全球[M].李贵苍, 虞文心, 周圣盛,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责任编辑：黄声波